

弘扬现实主义 书写时代风貌

——中国小说学会2017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述评

1月7日,由中国小说学会主办、江苏省兴化市委宣传部承办的2017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在江苏省兴化市揭晓。25部长、中、短篇小说上榜。

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表示,本年度的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与近期已出的一些排行榜相比,上榜作品很少重复、交叉,恰好说明本年度小说作品可供选择的对象之丰富,文学创作持续繁荣的景象可喜可贺。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作为国内举办最早、坚持时间最长、影响较大的排行榜,在评选中突出了一贯的学术性、专业性、民间性特色,努力发扬学术民主,大力发现优秀之作。从上榜作品的阵容来看,涌现出了不少新鲜面孔,青年作家们表现出旺盛的创作活力,强化个体对生活的体验和思索,叙事技巧、人生阅历和艺术功力进步明显,能够传达出比较丰富驳杂的城乡人生经验,展现时代精神。几代作家正在突破代际局限,不断地扩大和融会贯通自己的世界。上榜作品中现实题材占了很大分量。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正在成为作家们思考的重要问题。

社会力量的文学参与

汪政

中国文学的发展正在呈现出许多新的现象,其中有一点非常引人注目,许多社会力量参与到了当代文学的进程之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给当下文学注入活力、提供支持,贡献价值和智慧。无论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文学期刊与文学出版,还是文学创意、文学输出与传播、文学下游产品的开发,包括文学评奖,都可以看到各种社会力量的身影。这一格局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进行方式。文学越来越社会化、普泛化,当然也更为开放。我觉得这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也是一个社会文学呈现出活力的重要标志。在这个新的格局当中,文学正越来越走向社会,走向广大的民众,与各种社会力量形成了积极的、有建设性的对话关系。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意识到了文学的重要性,意识到了自己应该拥有文学化的存在方式,同时它们也意识到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必须承担起推动文学发展的责任,这无疑是一种文化自觉、文化担当,当然也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

同时我们更要看到,这样的对话关系打破了传统的文学运行的封闭的内循环模式,各种社会力量的文学诉求、文学理想,直接地反馈到文学的现场、文学的内部,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文学价值生产模式。由各级政府、企业、文化机构、大学和民间人士举办的文学评奖多得难以统计,这些评奖有针对作品的、也有针对作家的,有针对纸质的、也有针对网络的,几乎覆盖了文学的各种类型。可能有人认为,这么多奖是不是重复了?其实,只要认真地想一想,特别是把这些奖项的评奖条例、评奖标准仔细地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每一个奖项都代表着设奖主体的文学理想与文学标准,都有其存在价值和合理性。正因为有这么多不同的奖项,不同的社会力量对文学的主张才有了表达的渠道,社会对于文学多样性的强调和需求也得以呈现出来。而对文学多样性的强调,正是文学繁荣的前提,也是文学生态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通过诸如此类的活动,文学得以实实在在地走向了社会,参与到社会建设与发展当中。所以,社会力量与文学的结盟是双赢的事业。江苏省兴化市是一个有着悠久的人文传统特别是小说传统的县级市,许多小说名家从兴化走向了全国,而在兴化本土从事小说创作的人口也多得让人惊讶,因此,它被中国小说学会命名为“中国小说之乡”。近5年来,中国小说学会与兴化市进行合作,进行一年一度的中国小说排行榜的评审,借助这个合作平台,作家与批评家们走进了这个小说之乡,近距离地感受到了民众的文学热望,活泼泼的小说创作现场和他们对于小说的理解与期待,这无疑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专家们对于小说的认识,他们对小说的诸多要素包括小说与社会、与大众的关系有了全新的理解。而每次排行榜所推出的作品以及专家们对于小说的解读则给兴化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这样的合作其实是一个小说文化的孵化器,许多具有实效的合作方式不断被催生出来,讲座、改稿、地方刊物的专栏设置以及一对一的导师制等等,这些行之有效的举措正使得兴化的小说氛围越来越浓。我们看到,文学以它的方式参与到了地方建设当中,不断提升地方文化的品格,而地方也贡献出其鲜活的文学力量,并参与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进程之中。这可以看作现代社会文学存在的新的现实或未来。

大象的局部

——2017年中篇小说印象

段守新

中篇小说: 王安忆:《向西,向西,向南》 《钟山》2017年第1期 陈 仓:《摩擦取火》 《芒种》2017年第9期 孙 频:《松林夜宴图》 《收获》2017年第4期 刘建东:《丹麦奶糖》 《人民文学》2017年第1期 徐贵祥:《鲜花岭上鲜花开》 《人民文学》2017年第8期 胡 迁:《大裂》 《西湖》2017年第6期 东 紫:《芝麻花开》 《人民文学》2017年第5期 张学东:《蛇吻》 《十月》2017年第6期 张悦然:《大乔小乔》 《收获》2017年第2期 曾晓文:《金尘》 《江南》2017年第4期

2017年的中篇小说给我的基本印象是,对现实经验的关切和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倚重,仍然是它的主流。同样,这也是新世纪文学的主流。

好的小说应该能打开人性的褶皱,让我们看到灵魂深处的隐秘,也由此触摸到它与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历史和现实的关联性。张悦然的《大乔小乔》和石一枫的《借命而生》很好地抵达了这一文化和美学目标。《大乔小乔》不断在现实与过去之间闪回切换,以此映照、凸显妹妹小乔被扭曲的成长轨迹和精神历程;作为一个意外超生的孩子,始终被父母长期排斥在家庭之外,为了生存,她付出了远比他人更艰难的努力,也无法不在内心形成一个黑暗的渊藪。她在自利和亲情之间撕裂而又扭结,直到大乔因为不堪生活的重负投河自尽,她的人性才在疼痛和震惊之余逐渐复苏。《借命而生》的情节推进动力则建立在一个类型化的警匪叙事模式上。警察杜湘东和逃犯许文革的角力贯穿了他们大半生的光阴。两个人升沉起伏的命运,像两股麻绳紧紧地绞合在一起,连动着20多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从历史的快车道被甩出来的人,杜湘东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成了暮气沉沉的“杜爷”,固然是人生的“失败者”;许文革风云际会不仅成了一个富豪,而且洗白了自己,看似“成功”,却也逃不过被更有“来头”的人打垮的结局。他们的悲剧,来自于他们的刚硬与这个时代的深刻错位和冲突。

严歌苓的《你触摸了我》借助作家萧穗子的回顾性视角,追忆、想象、咀嚼和剖析了昔日文工团轰动一时的“触摸事件”以及对当事人日后命运的影响。“活雷锋”刘峰对林丁丁的表白和“触摸”,不只被林丁丁,也被她的战友们认为是不能接受的。正是那样的时代,才造成了对人的这种僵硬和偏狭的理解,也造成了当事人此后坎坷失意的人生。然而,人性有其猥琐不堪的一面,也有其对善良的珍重和守护。这集中体现在小说另外的一个主要人物何小曼的身上。“一个始终不被人善待的人,最能识得善良,也最能珍惜善良。”正是她,在漫漫岁月里一直紧紧地伴随着刘峰——即使不是在身体上,也至少是在精神上,在灵魂的深处。小说显现出严歌苓对个人与时代、个体与集体、“好人”与“强人”、(人性的)高贵与卑下等等多重关系的深度思考。

王安忆的《向西,向南》同样在个人生活轨迹的变迁上,投射出纷纭繁杂的历史信息。这是一个“上海人在纽约”的故事,只不过,与其说它讲述的是“美国梦”的实现,不如说是幻灭。历经丈夫的出轨、女儿的背叛,何玉洁或许发现,生活永远没有落地生根,而是充满着不可预知的可能性。向西,向西,向南,流动和漂泊既是被现代性紧紧围困的每一个人的宿命,同时也表征着何玉洁们对人生意义的执著找寻。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人是一个秘密。应当猜透他,即使你穷毕生之力去猜解它,也不要说虚度了光阴;我正在研究这个秘密,因为我想做一个人。”这也是许多中国作家致力掘进的目标。以2017年上榜的中篇小说而言,孙频的《松林夜宴图》、东紫的《芝麻花开》、陈仓的《摩擦取火》等,都在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而展开。只是,在如何兼及思想和艺术的平衡协调上,有的作家交上了令人满意的答卷,而有的作家,毋庸讳言,还是留下了或大或小的遗憾。最后,我把一份必要的哀悼和敬意献给离世不久的青年作家胡迁。他的遗作《大裂》显示出惊人的才华和洞察力,以一种荒诞和变形的形式,有力地呈现了一群大学生“你别无选择”式的存在状态——破碎的、混乱的、虚无的、充满着焦灼感和无力感的——其实,这也是有关我们的现代性生存的一个整体象喻。

2017年已经过去,2018年又接踵而至。古往今来,人事代谢,而文学之河兀自浩浩荡荡奔流不息。我们伴随着它一路前行,且总是忍不住要发一点深深浅浅的议论——但无论说什么,我们的头脑里应该始终保持着一种必要的自知和自省,因为那个古老的寓言很早就智慧地提醒我们:不要以为你完全拥抱了一头大象,你充其量只是摸到了它的一只耳朵,或者尾巴。

战争沉思与精神透视

——关于2017年的部分长篇小说

王春林

如果说《唇典》与《劳燕》聚焦于战争,那么,上榜的另外三部长篇小说所聚焦的,就是作家笔下人物的主体精神世界了。首先明显具有精神分析学深度的是鲁敏的《奔月》。《奔月》艺术形式上最大的特色,就是对于假定性叙事形式的巧妙设定与使用。小说的核心事件是女主人公小六一次意外车祸后的悄然失踪。借助于小六的悄然失踪,作家所渐次打开的,正是这一现代女性那样一种其实一直掩藏很深的精神世界。如果说,曾经的小六表面上是温顺乖巧的,那么,这个被叙述者逐渐发掘并呈现给广大读者的,则是一个奔放的现代女性。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出现在他者视阈中的自我,往往是受到道德、法律等社会性因素强势监督的“超我”。往往地,一个人只有在独处的时候,在逸出了他者的视阈之后,更多地由本能控制支配的那个貌似“张牙舞爪”的“本我”才会浮出海面。

“既问苍生”,固然是《心灵外史》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层面,但“也问鬼神”,对国人精神信仰层面上心灵深渊的存在做真切的深层透视,却更可以视为石一枫小说创作的一种新开拓。这一点,集中通过大姨妈这一被刻画得活灵活现的女性形象而凸显出来。具体来说,在这部虽然篇幅相对短小但叙事时间跨度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长篇小说中,大姨妈精神信仰方面的疾患,乃集中通过四个关键性的时间节点而体现出来。从作家石一枫的角度来说,大姨妈最后到底信了什么或者干脆就不再信什么,实际上也都是不重要的。真正重要的事情,在于石一枫《心灵外史》的写作本身,在于作家以如此一部具有心灵冲击力的优秀长篇小说关注、思考并表现了国人的精神信仰问题。

最后要提到的是范迁的《锦瑟》。小说所集中透视表现的,乃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一段知识分子的精神秘史。对于男性主人公失败的人生,恐怕还是刊物编辑给出的理解最为到位:“由于知识分子本身的软弱和动摇,注定了他自身改造的不彻底性;他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时期都无所适从,同时为个人情感心绪所左右,使他在人生道路上举步维艰,处处受挫,锦瑟无端五十弦,人生匆匆半百载,回首遥望,感叹无限。”

飞宇的《两瓶酒》,看似叙述了两个并无血缘关系的家庭之中数十年的友情,但在故事的缝隙之中,“大侄子”无奈、尴尬而又困惑的生存心绪,一直萦绕在话语之中。范小青的《你的位置在哪里》和朱辉的《然后果然》都是借助错位的生存事件,揭示了人物在自我角色遭受颠覆之后的尴尬和困顿。钟求是的《街上的耳朵》从中年男子式其的内心出发,让一位并不相识的女性,勾连了他的命运轨迹。青年时期的式其,因为小巷深处飘然而来的一位陌生女性而失去了一只耳朵,以至于他从此之后不得不留着长发;中年之后的式其,又因为一次饭局上偶得的信息,决意去参加那位小巷女性的葬礼。由是,对方丈夫和式其之间,开始了饶有意味的心理搏击,它无关伦理,却直指尊严。

日常生活看似波澜不惊,但在它蕴藏了无数人性的可能状态和命运的不可把控,就像伊格尔德斯顿所言:“日常生活就像瓦格纳的歌剧,错综复杂、深不可测、晦涩难懂。”在2017年的短篇中,像周李立的《骨头》和任晓雯的《别亦难》,都呈现了庸常生活背后血缘、亲情与人性的尖锐较量,无法迂回,也誓不妥协。与《骨头》等小说相反,晓苏的《父亲的相好》、张翎的《都市猫语》、次仁罗布的《强盗酒馆》、龙仁青的《唐僧肉》等短篇,则洋溢着某些人性的温情。这种温情,不是基于外在的怜悯或同情,而是源于人物内心深处的理解和抚慰。《父亲的相好》以一个晚辈的视角,叙述了父亲的婚外之情。从年轻时的轰轰烈烈,到后来的彼此牵挂,在“我”的视角中,父亲与李采之间的情感,早已超越了欲望,超越了功利,仿佛有着亲情般勾连。作者的用力之处在于,他呈现了一位甘于隐忍、内心宽广的父亲,也展示了一位坦荡而善良的女性。

当然,更多的小说还是着力表现日常生活伦理对于人们生存的冲撞。这种冲撞,无法让人抽身事外,也无法进行是非判断,人们只能置身其间,左奔右突,承受着内心的撕扯。譬如,叶兆言的《滞留于屋檐的雨滴》中,备受身世折磨的陆少林,虽手艺精深,但命运始终将他压在世俗的尘埃里。南翔的《檀香插》中,妻子对于丈夫的信任,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问讯撕开了深不可测的裂口。万玛才旦的《气球》围绕着生育与转世的冲突,使家庭氛围变得骤然紧张。这些小说所叙述的都是中国式的日常生活,它们在各种伦理的层层包裹中显得漫无头绪,也让每个人都不得不负重而活。

在2017年的短篇中,还有一些别具特质的作品。如双雪涛的《宽吻》,以寓言性的笔触,叙述了现代都市中人们的面具化生存景象。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仿佛是一只只宽吻海豚,脸上永远保持着微笑的姿态,只有在夜深人静之时,他们才明白自己都是一群失去了方向感的存在。东君的《好快刀》则以志怪的手法,叙述了一个浑身长满鱼鳞皮的少年坎坷的人生和内心畸变的过程。

人是一种生物的存在,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存在,“这一事实将对我们如何度过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英格利斯特语)。当前的短篇小说创作,逐渐远离宏大的社会命题,回到微观化的日常生活内部,这或许不是一件坏事。

短篇小说:

叶兆言:《滞留于屋檐的雨滴》

《江南》2017年第3期 毕飞宇:《两瓶酒》 《人民文学》2017年第11期 钟求是:《街上的耳朵》 《收获》2017年第3期 万玛才旦:《气球》 《花城》2017年第1期 李延青:《匠人》 《当代》2017年第2期 朱 辉:《七层宝塔》 《钟山》2017年第4期 南 翔:《檀香插》 《芙蓉》2017年第2期 贝西西:《谁是李俏》 《雨花》2017年第11期 赵红都:《英式下午茶》 《莽原》2017年第2期 叶 舟:《兄弟我》 《十月》2017年第4期